

书香如葱香

文/黄发有

济南这座城市,总让人想起那副著名的对联:“四面荷花三面柳,一城山色半城湖。”济南人喜欢把这个城市比喻为摇篮,而我倒觉得它更像一个巨大的瓷碗。站在南部群山的高处,北望济南,只见隐约的街道反复缠绕,像极了盛在大海碗里的粗细不同的面条。泉水和大明湖,有点老汤的意味,汤色透明,但回味无穷。我绕了半天的弯子,只是为了给我的一个比喻作铺垫——这座城市里的书店,就像漂在面汤上的葱花。它是那么不起眼,细碎得可以忽略不计,但少了它,总觉得缺了点什么;再者,城市里的书店总是搬来搬去,被各类时尚商店挤到大街的角落和小巷的深处,而在马路牙子上临时摆设的小书摊更是居无定所,这真是像极了在面汤上游荡的葱花;三者,书香如葱香,山东的大葱远近闻名,嗜好者哪顿饭都离不了,吃不来的闻之掩鼻。这个年头人对于书的兴趣,与对葱花的兴趣有太多相似之处,在爱好者的食粮里也只能占极为有限的比例,点缀而已。像我们这些靠钻书混饭吃的人,成天把大葱当成主菜,吃得满身的大葱味道,打一个饱嗝能飘出三里远。

我在山东大学执教多年,一度对济南的书店了如指掌。最起眼的书店,还得数新华书店泉城路店、大观园东图等,长得郁郁葱葱,它们都有自己的根据地,像是济南人用来蘸酱吃的大葱,葱衣

被剥得干干净净,雪白雪白地码在白瓷盘里,食客操起一根握在手里,张开嘴巴就啃,显得异常豪放。这些店店面宽敞,图书品种包罗万象,也带着官样气派,从来不打折,到了时间就打烩。在网络书店的冲击下,大店开始走多种经营的路线,卖书的地方越来越小,腾出来的店面开始卖文具、玩具乃至家电。至于特色店和民营店,星星点点,像极了细碎的葱末,在城市的角落里打游击。这些店鱼龙混杂,主营的多是时尚的、媚俗的书刊,赚钱门道与摆小食摊的多有相似之处:风向不对了就撤,无长远眼光。十几年前,山大南路上常会有用三轮车载上一堆新书的流动书摊,我从不交易,但不时会看看有什么书上摊了。(全是盗版书)

印象最深的是两家主营学术书的民营书店——三联书店分销店和致远书店。我较熟悉的是前者,三联书店的老板看我成天买书,送我一张享受优惠折扣的会员卡。我在致远也买了不少书,美中不足的是不打折。三联书店的老板白峰曾经是《山东文学》的编辑,很长一段时间保持着“非文化类书籍不卖”的传统,这家书店搬来搬去,最早落脚于文化东路山东艺术学院旁边,1999年搬到了文化东路一家银行的底层,2001年搬到了珍珠泉附近的一座小楼上,不久因为城市改造而被拆除,2007年书店搬到了山大路的数码港,2009年搬到县西巷泉乐坊北

段。从2013年到2014年,不断从报章和网络中看到这家书店关门的新闻。白峰说了句很感伤的话:“还常梦见自己在经营书店。”济南一带爱书人,大海捞针一样追寻三联书店,向路人打听时,常被引向“三联家电”。在一些爱书者的心中还有些非分之想,就是期待这家书店有朝一日会起死回生?位于文化东路102号的致远书店1996年开张,招牌由启功题写,作家张炜曾担任学术总监,遗憾的是这家书店已于2012年12月关门。

说到淘旧书,大观园附近的旧书摊上,不时有一些值得收藏的图书,譬如一些难得一见的十七年和“文革”图书,三三元就能购得,顶多二十元一本。至于山东大学校园内的地摊,既让我感到亲切,有时也让我觉得无奈。学生毕业离校时,总会摆摊卖课本、考试图书和课堂笔记,很多所谓的专著一两元就被处理掉了,课堂笔记的价钱大致与授课老师的受欢迎程度成正比。

看书真如吃葱,同一个食客,厌食时会觉得它臭不可闻,胃口好时说起它就满口生香。不变的是,一个买书人成捆成捆往家搬书,甚至出现把书买重了的情况时,他看的书只能是越来越有限了。■



一壶苦茶
画/忆明珠

被“计算”出来的历史定律

文/郑慧

以前始终不明白一件事,从小学开始就一遍一遍学的历史课,为什么到了后来还是成了脑子里的一锅粥?假设历史是一堵其实有门的围墙,那么我们中的大多数沿着围墙走了十几年,却连门的影子也没找到。

十几年前,读黄仁宇的《万历十五年》,才知道做皇帝比做劳模还要辛苦,天不亮就要上早朝,所以坚持勤勉的皇帝总是稀少,因为实在是个自律成本很高的活。写了《潜规则》和《血酬定律》的吴思坦言曾经模仿《万历十五年》的笔法,但笔法终究是自己的顺手,后来作罢。不过,吴思认为《万历十五年》写得好,但是“没说透”,黄仁宇想说明白又没有说明白的,正是“潜规则”,即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,却在实际上支配着社会运行的规矩。

从《潜规则》到《血酬定律》,里面“灰牢”、“白员”、“隐身份”等生词迭出,吴思为此在自序里写了一段解释何以“杜撰新词”。其实他取的书名就已经够“生猛”的了,《潜规则》的副题是《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》,到了《血酬定律》,副题又成了《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》。如果我们没有被这些题目吓跑,也没有对它们不屑,然后又居然一口气读完了,那么,这无疑是一件运气不错的事情。

《血酬定律》里的《县官的隐身份》一节中,海瑞就是一个“招待所

所长”。这个结论是海瑞自己下的,吴思却用“计算”的方式还原了历史。“按照当时流行的常规,显要官员路过淳安,大概要用接待费二三十两银子,以概价折算,在人民币六七千元上下。如果巡抚路过淳安,接待费要用去银子三四百两,将近十万元人民币……”而海瑞的“章程”则是“一般官员合计不过五六钱银子,约145元人民币。如果上司驾到,合计不过200元人民币”。与此同时,吴思还认真列出了从“银子”到“人民币”的计算过程。

吴思的这种“计算”,可以说从头到尾,分布在所有篇章的角落角落。他这么一算,不仅算出了“银子”到“人民币”的距离,也算出了尘封的历史和遥远的我们之间认知的距离。他这么一算,让我们之前仅有的一知半解的历史彻底成为一笔糊涂账。

这么算来算去,吴思算出了“潜规则”,算出了“血酬定律”,算出了合法伤害权之后的利益分配,算出了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。估计连吴思自己,对于这种以经济学的角度诊断历史的“药效”也始料未及。他只是在一次访谈中论及《微观经济学》,“尽管书中分析的是市场,但是理性清明,分析精巧,对我理解人心的一般状态和人际关系的均衡状态大有助益。读后有散光眼配了眼镜之感。”还有

《制度经济学》,因为“用微观经济学的清明理性来分析制度变迁,这是一门历史学可以借用的好手艺,一旦学会了这种思路,想忘掉不用都难”。

《县官的隐身份》到了篇末,居然还记录了徐霞客的“证明信事件”。崇祯十年秋,徐霞客在广西游历,他无权免费使用公家的驿传系统,也就是海瑞以一己之力抵抗而无奈为之辞官的“民害”。“但是,凭着地方官赠送的马牌(使用驿传的证明信),徐霞客却支使村民为他和仆人抬轿赶路。主仆加上行李,动辄要用七八个夫役。村里人手不够时,还用‘二妇人代舆’——让妇女为他抬轿。此外还要供他吃喝,有鱼有肉,‘煮蛋献浆’。”吴思认为,徐霞客是我们的文化精英,但《徐霞客游记》也真实记录了把旅游费用转嫁到农民身上的历史“潜规则”。

从历史的一锅粥,到慢慢算清糊涂账,我们的生存,才能一天比一天清晰。■

我与《开卷》

文/曹寇

去年岁末,参加南京作协理事会年终会议。这种场合,如果你乐意或被点名的话,免不了要说点场面话。我没说,听。与会者发言大多使用普通话,这是可以想见的,一向被誉为“规范”或“上台面”。不过,有一个人坚持用南京话发言,这倒让我感到惊奇。我一直对普通话过好的人保持警惕,而对能自信地使用母语(方言)的人抱有好感。在我看来,普通话是权力的象征,相当无情,亦无趣。母语反之。这个说南京话的中年汉子就是编辑《开卷》达十五年之久的董宁文先生。我知道南京有这号人,以前也看过几本《开卷》,仅此而已。没想到会后,董说他认识我,再次让我大吃一惊。一聊,依稀想起来了什么。

大概十五年前,也就是《开卷》刚刚编印之初,我曾去位于凤凰台饭店八楼的江苏文艺出版社找我大舅(张昌华,时任该社副总编)。那时候我二十出头,是一名乡村中学语文教师。业余专事阅读和胡思乱想。所以,我一般去大舅处,他总会给我一些书。那回大舅带我到饭店某层楼的一个茶吧。这个茶吧挺讲究的,架上有书,墙上是民国大师肖像。大舅向我推荐的就是刚刚编印出来的《开卷》杂志。外观素朴、趁手,属于床头桌上可以随取的小书刊。打开看,作者大多是海内外的“老文人”,气息浓烈。再细看,排版舒服,字号行距俱佳。虽非公开刊物,却毫无民刊的怨愤和简陋。我当时立即就意识到一点:凤凰台

作为一家饭店居然还能向宾客赠阅这么高级的读物,确实远超有些叫人恶心的“企业文化”。大概也就是这次,曾与董宁文先生打过一个照面。我忘了,他却记住了。

关键是,那次我还办了一张会员卡。这张卡的意义就是我经常能收到《开卷》。我不能恬不知耻地说《开卷》对我有过多大影响,但我可以肯定的是,这本小小的刊物有如清茶有如水仙,于我粗鄙的生活而言,是一阵阵不可多得的芬芳。

后来就再也没有收到过《开卷》,去大舅处,他也没有提起。现在才知道,《开卷》早已脱离凤凰台饭店,十多年来仅凭董宁文先生独力支撑,并在圈内外拥有众多拥趸,影响深远。这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。

再说我。在这十多年里,我写起了小说,像喷一样写了不少,出过几本书。不过诚如我的小说方式,本人也以唾沫四溅的方式活着,经常有虚脱之感,躁得慌。和董宁文先生重逢后不久,收到一叠他的赠刊,坐下来认真读了几期,一种伤感油然而生。不仅有《开卷》十多年如一日固有的芬芳,我似乎还嗅到了自己青春期的气味。《开卷》依旧,而我已经步入中年。我想,作为一种因缘,是否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劝诫我:是静下来看点书的时候了。■